

鑿壁引微光

專訪梁鴻：



●梁鴻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。記者胡若璋攝

起學習愛

的啟發重新叩問：人，何以為人？愛，該如何去愛？

「學會如何去愛，什麼樣的愛是真正的愛，是我們中國人從未真正開始或完成的功課。」梁鴻的文字和話語，總帶着一種犀利的清醒。「之前我們稀裏糊塗過來的，現在稀裏糊塗過不去了。」因此梁鴻在書中也會感念：孩子是替我們在受苦，因為他們是我們社會的神經末梢。

談及青少年問題的社會根源，梁鴻直言，在現有社會教育體系、制度框架等多重藩籬的束縛下，宏觀層面的改變道阻且長。但對每個家庭而言，改變的契機往往藏在意識的覺醒與觀念的轉變之間。作為人文學者，梁鴻有着清晰的自覺與擔當：越是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，越需要我們直面新的倫理挑戰。她始終堅信，人文學者不能被流行的概念裹挾，反而要「反其道而行之」。因此在《要有光》的寫作中，她格外警惕濫用大詞、熱詞。

拆解概念 去看看背後遮蔽的東西

「概念用得越頻繁越顯蒼白，還會慢慢被固化成僵化的認知標籤。」在梁鴻看來，一個好的作家，就應該把社會中約定俗成的固有認知重新拆解、還原本質。回到青少年心理問題這個核心議題，我們掛在嘴邊的「愛」，難道不該停下腳步重新審視、深度反思嗎？她始終堅持，要把那些司空見慣的詞語一層層剝開，去探尋其背後真實的內在形態。這正是她作為文學寫作者的積極實踐：拆解一個個固有概念，撥開標籤的遮蔽，琢磨那些被概念掩蓋的真相與本質。

也正因此，在《要有光》的創作中，梁鴻對「原生家庭」「青春期叛逆」這些被廣泛使用的詞彙格外警惕。「我幾乎很少用這樣的詞，因為它們一旦被拋出，思考就容易被框定在既定框架裏，很難觸及問題核心。」梁鴻直言，現代人談

及孩子的情緒波動，總習慣用「叛逆」二字簡單概括，彷彿這兩個字就能定義，甚至「解決」孩子所有的情緒困擾。

曾經有三年時間，梁鴻輾轉全國各地，一次次走進不同的家庭，坐到一個個受困孩子的身邊。她親眼見證了許多家庭裏的情感壓抑，父母的過度期待如無形的枷鎖，隱性的控制與不經意的忽視交織蔓延。並進而愈發堅信，當孩子出現焦慮、抑鬱、厭學、社交障礙，甚至陷入更嚴重的心理危機時，真正的關懷從不是急於用概念定義問題，而是要深入每個具體的生命故事，去理解那些複雜成因背後的無奈與掙扎。

尤其，身處AI激盪的時代，一個樸素的問題被放置到人類面前：什麼是真實？人類終究何以為人？

「不要迷信你所看見的『真實』，有時候你以為的所見所聞，看似真切，實則未必是真相本身。」作為內地非虛構寫作的先鋒，梁鴻也有着自己的清醒洞察：有些故事即便源於採訪所得、出自自身經歷，呈現出來卻總少了幾分真切。尤其在當下的社交媒體時代，太多事物經過剪輯、過濾與美化，那些被包裝後的「非虛構」，本身或許就藏着難以察覺的虛假。

目的都是為了寫出一種真實

「無論何種寫作，最終能打動、觸動讀者的，核心都離不開『真實』二字，這才是寫作的生命所在。」梁鴻坦言，當下之所以格外強調非虛構，本質是因為真實正在被不斷挑戰。談及自己引領的內地「非虛構」寫作潮流，她說，當時就強烈感覺到，寫作者必須走出書房，不能再懸浮於雲端、困在虛假的文字叢林裏。我們需要重新腳踏大地，去接觸真實的面孔，去傾聽不同的聲音。

「這些『走出』與『走近』，最初就是對一段時期內虛假寫作的反抗，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寫出那份經得起推敲的真實。」梁鴻也感慨，這個過程更多是一種「逼近真實」的努力，並不是就一定能完全抵達真實。

但有一個信念她始終篤定：「AI時代反而更需要人文精神，更需要一個個寫作者以自己的方式，去體察人類的情感與生活狀態。」梁鴻覺得，這正是作家可以強大存在的時刻。她笑說，作家寫下一個個活生生的人，哪怕有一天這些鮮活生命變成了資料，也是「我們」用文字為世界留下的印記。某種程度上，AI的興起反而激發了她的寫作鬥志。

《要有光》的創作之路，並非坦途。手握多年積累的採訪材料，梁鴻的內心始終被巨大的情感波瀾裹挾。她選擇了最「笨」也最真誠的寫作方式：反覆聆聽採訪錄音，感受每個人的語氣語調，盡力還原當時的場景與心境。而如何用寫作者的內在邏輯，梳理龐雜的素材、抓取核心的真相，這個過程讓她備受煎熬。「整個寫作期間我生了兩場病，最後被診斷出慢阻肺，兩個肺都有炎症。」新作完成後，梁鴻回了一趟老家。

「姐姐發現我沒有她想像中那麼疲憊，反而透着一種巨大的放鬆。」那一刻梁鴻忽然明白，寫作不僅是自我療癒的過程，更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成長。「面對這個世界，我多了一份坦然承接的勇氣。」這份勇氣，她發覺，正是在與文字、與真實的對話中慢慢積累的，「你不知道哪一刻就抵達了這樣的狀態。所以我要覺得，寫作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教育，讓我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正向的蛻變。」

「以前稀裏糊塗過來的，現在稀裏糊塗過不去了。」人文學者梁鴻的筆鋒，總能精準剖開時代的褶皺。繼「梁莊」三部曲以鄉土之鏡照見中國社會發展的肌理後，她的非虛構新作《要有光》，將目光投向了困在心理泥沼裏的青少年——失學的、休學的、在退學邊緣徘徊的孩子，以及他們身後，同樣「缺愛」的家庭。

耗時三年俯身傾聽，梁鴻不談宏大救贖，只言「鑿壁引光」的樸素心願。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，她也直陳野心：希望寫給生活在這片大地的所有人。也希望在不同代際的溝壑之間，大人與孩子都能學習愛，以微光相互照亮，重新審視彼此作為個體存在的意義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

黃燈：讓孩子在土壤裏自己生長一會

「所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能不能站在小孩的角度上看問題至關重要。」在梁鴻新書《要有光》的廣州讀者見面會後，同為非虛構寫作者，且對年輕人的社會生存圖景抱有關切的黃燈，也現身分享對「光」的理解。

在她看來，社會早就流傳各類名言，例如「世界沒有真相，只有視角。」這些名家金句也試圖告訴大家，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見，和看到的不同真相。

「和孩子相伴時，我們是否願意俯身傾聽、換個角度觀察？或許那樣看到的，會是完全不同的問題本質。」作家黃燈想起一個媽媽的故事：孩子一兩歲學步時，她在孩子胸前掛了一個攝像頭，想記錄孩子眼中的世界。後來回看錄像，她深受震撼：在孩子的視角裏，平常的台階變得格外高聳，溫順的小貓也成了龐大的動物。

「我們總習慣對孩子說『跳下來沒關係』，卻從沒意識到，在當時的他們看來，那或許就是一道巨大的懸崖。」



●梁鴻（中）與黃燈（左）對談。
受訪者供圖

黃燈感慨，當我們和身高僅70公分左右的孩子同行時，太容易停留在自己「1米7」的成人視角裏，而忽略了孩子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什麼是視角轉化？這個媽媽的做法給出了答案。關鍵就在於，成年人是否有主動改變意識、調整觀念、切換視角的自覺。「試著去理解孩子的處境，慢慢就會和他們形成一種默契。」黃燈坦言，閱讀《要有光》時格外有共鳴，梁鴻甘願做一個耐心的傾聽者，把孩子的種種處境真實呈現，這份澄明的心境格外讓人動感。

「她確實聽懂了孩子們内心那些細微的聲音，知道他們真正在想什麼、需要什麼。」黃燈分享着自己的閱讀感受。在她看來，孩子就像一顆種子：從「光」的角度來說，種子有時需要在土壤裏默默扎根、獨自生長，等它破土而出時，父母只需做好「光合作用」，給予適當的陽光與滋養就夠了。黃燈覺得，人始終被強光照射也會難受，成長路上，有時候也需要在暗處沉澱、默默生發的空間。

談香港：豐富與固化並存

特稿 梁鴻的目光從未局限於內地，早年間便已投向整個東亞社會。在她看來，「香港作為東亞地區的開放城市，發展方向更多元，人們的選擇也更為豐富。」但遠觀之下，她依然深切感受到，此地的「權威化、秩序文化」烙印着獨特而深刻的印記。

「我們不能簡單評判其好壞，它實際上對我們內部的文化結構起到了極大的固化作用。」梁鴻認為，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中成長的孩子，會天然認同「成績秩序」，這也讓香港的孩子同樣深陷內卷。「儘管他們內卷的方向和出路相對多元，但對『人上人』的價值渴望，始終是我們文化中的深層基因。」她進一步追問：究竟什麼是「人上人」？

「我們的生活被無形劃分為三六九等，職業也被貼上高低貴賤的標籤。」梁鴻舉例，一位老師或許會隨口對學生說「你考不好就去送外賣」，這句看似平常的教育話語，背後暗藏的卻是對職業的偏見，以及對「人上人」價值的盲目推崇。

「這種偏見與秩序已滲透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極難破除，或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。」梁鴻由衷感嘆，「正因如此，今天的孩子才會以『生病』的形態，折射出這種文化的病態。孩子是替我們承受苦難的群體，他們是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末梢，我們社會所有的病態與失衡，都會在他們身上淋漓盡致地顯現。」

比起評斷，更應盡力分析複雜

儘管現實的嚴峻程度遠超書中所寫，但長期

與全國多地家長讀者交流的梁鴻，依然心懷美好願景：「我想，改變的契機或許已經到來。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十年、二十年，但當下的社會正處於變動之中，只要有改變發生，哪怕只是一絲微光，我也堅信，它終將匯聚成束，慢慢照進並照亮每一個角落。」

當記者好奇詢問，未來是否會走近香港這座中外文化交融之地，讓日光在此停留時，梁鴻回憶起撰寫「梁莊」系列時的宏大計劃：「曾經想走訪亞洲各地的農村，觀察東亞社會農村的不同發展狀況。」雖然後來計劃擱置，但她坦言，時至今日，自己對東亞教育體系中孩子的成長困境，始終抱有濃厚興趣。

「因為在『教育與成長』這一宏大文化母題之下，每個社會的呈現面貌都截然不同。」梁鴻希望，能去發掘生活中那些被忽視的盲區與隱秘角落。作為歷史結構的一分子，我們該如何回歸個人語境，審視自身如何成為歷史的一部分，而這部分歷史，恰恰需要我們保持警惕並重新思辨。「我會以更多分析的姿態去切入，而非直接評判好壞。」她着重強調，評判是最輕易的行為，而我們真正該做的，是沉下心去剖析事物內在的複雜性。